

一个配音演员的日记

肖 南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PDG



作者像

目

次

(SC).....	东援西引.....	(1)
(EPI)	也算序言.....	(2)
(EPI)		
(CPI)	一个配音演员的日记.....	(3)
(CPI)	“何日翻版?”.....	(3)
(CPI)	“初战披靡”.....	(6)
	二次上阵.....	(13)
(CPI)	“事半功倍”还是“事倍功半”?	(15)
	难过口形关.....	(22)
	“翻译腔”	(31)
	我不干了!	(40)
	为配演人物做传.....	(50)
	“环境感”	(66)
	摹拟动作.....	(86)
	每句台词都有视象吗?	(93)
	“身临其境”	(100)
	配音演员的几种限制.....	(104)
	又一次失败.....	(112)
	先念台词就一定虚假吗?	(117)

(1)	配演领袖人物所遇到的问题	(128)
(5)	顾虑重重	(128)
	寻找动作	(133)
(8)	正确的自我感觉	(145)
(8)	配音演员和谁交流?	(149)
(11)	外国影片不可译吗?	(165)
(21)	上 二	
(21)	“三言两语”的后记	(185)
(25)	“三言两语”	
(18)	“三言两语”	
(15)	“三言两语”	
(15)	“三言两语”	
(20)	“三言两语”	
(28)	“三言两语”	
(16)	“三言两语”	
(11)	“三言两语”	
(11)	“三言两语”	
(21)	“三言两语”	
(11)	“三言两语”	

东 援 西 引

“……《千斤话白四两唱》”。

有人问伟大的意大利演员托玛佐·沙尔维尼：“悲剧演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要有声音，声音，声音！”

《演员自我修养》第二部，
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112页

戏剧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，其思想是用综合的手段表达出来的，但语言却是感染观众的基本的、主导的手段。造型的表现力只能补充语言的感染力。在戏剧演出中一旦把重点由语言挪到造型上面，我们就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主义。

克涅碧尔：《演员创作中的语言》，

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版11页

“……思想的直接现实，就是语言。”

马克思、恩格斯

转引自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》，

中华书局1956年版21页

也算序言

首页上的“东援西引”这种做法就可能有点犯忌，颇象一些过时的东西。但人的习惯是不容易改的，总觉得名人、前人说过的话比自己更可信，所以为了给自己壮胆，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

我从事翻译片工作三十多年，中间除了下乡劳动、参加社教、插队落户以及那震撼中外的内乱之外，总也有二十多年是从事这一行当的。走过的路上难免要留下一些模糊的脚印，于是我总想描画、廓清自己的脚印，但不知除了对我自己以外，它对别人是否有什么用处？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以“心诚则灵”的精神写完了这本不太成样的东西。

一个配音演员曾经是如何工作的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。这是在我早年的演员日记的基础上，经过归纳、整理、加工而成的。它只说明过去，而不说明现在和将来。

日记中，我采用了导演和演员对话的表现形式，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，倒不一定每一段都真有其人、真有其事、真有其言。

至于具体内容，在亲爱的读者尚未进“正餐”之前，我不想倒你们的胃口，先上一道“木屑”、“碎纸”之类的东西，又加翻译片本来就象个“营养不良的孩子”，还是多余的话说得越少越好。

一个配音演员的日记

何 曰 翻 版 ？

一月二十日

寒风凛冽。

早上，为了到东影四期训练班报到，我几乎坐了一夜火车，带着简单的行装，从吉林市赶到刚刚解放三个月的长春。

我一身土气，穿着一套新做不久的旧灰布棉干部服。所谓新，是因为两个月前才发到我手里，里子基本上还是白的；但面儿已经破旧、肮脏得不成样子，刮了好几个破口，灰黑色的棉花向外裸露着。我从接触革命那一天起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观念：似乎谁越不注意生活小节、谁越衣着不整、谁就越革命。因此不管是新棉衣还是旧棉衣，似乎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穿着条例：袖头内侧是擦嘴的，衣襟是擦手的，整个衣袖的外侧是抹布，分管擦桌子、椅子……。至于坐在哪儿、躺在哪儿，就更无所顾及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去为集体伙房领豆油，需要把一大铁桶豆油现打开，才能付给我油。我就帮人家又搬又抬。可桶盖怎么也拧不开了，于是我又和那位工作人员用一根铁棍狠命地撬。撬了半天，盖子突然一下子飞走了，豆油立刻喷溅出来。我正好拿着铁棍站在最前面，首当其冲溅了我满身的油。那位工作人员十分抱歉，可我却毫不在意。本来就十分“革命”的服装，这一下就更增添了“革命色彩”喽。我就是

穿着这身衣服，来到了长春的东影。

除夕之夜

一些来自四面八方、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，是足够有意思的。由于我是从“老区”来的（其实也“老”不了多少，这只是相比较而言的），就当然的当上了班长。这是按军队建制，十几个人的小头头，照一般说应该是组长。

我荣任班长后，第一个任务是组织大家过好春节，不让学员们在除夕之夜想家。为达到此目的，除了训练班——“班一级”安排的活动，如电影、联欢等，到我们这“三级”班就只有一项任务是具体的——包饺子。这项平凡而为中国人所必需的业务专长，在那个年代还是大多数青年人都掌握不了的。我们都只会吃，而不会做。不过任务既然已经交下来，只好大家团结一致、共同动手、冒险一试了。工作进行中，情绪很高，有的揉面，有的揪“剂子”，有的擀皮儿，有的包，有的摆……一直忙到半夜。包完饺子就按班序自己拿到厨房去煮。前呼后拥，去了七、八个，象个小小的仪仗队。呼啦一下子，就把锅台周围的阵地全部占领了。你一言、我一语，他擀一下，他擀一下，连音响带动作，热闹非凡。大批后续部队还等在厨房门口，随时准备冲上来。这个煮饺子战役的战果是可想而知的，使得饺子——“全军玉碎”。虽然尚未化为齑粉，但片汤大局已定。最后，全班盛回来两桶连汤带水的饺子片——算是战绩。饺子会战，在战术上是失败的，但在战略上是成功的。全员情绪高涨，阖家欢乐——不管怎么说，总是吃上了自己动手包的第六顿饺子。……

……除夕之夜，学员们都在议论一个问题：到什么岗位上，去分配到部队去的，已经走了。连日来还不断有到发行公司

去的以及到其他部门的。只有到厂内的还没有动，只是传说谁要去当演员，谁要去当摄影，谁要去搞录音等等。

今天午饭后，领导把我找去，一进屋就对我说：“你被分配到翻版组，准备一下，后天早晨就进厂，带着行李！”

“你被分配到翻版组，准备一下，后天早晨就进厂，带着行李！”

“翻版组？什么翻版组？哪几个字？干什么的？”我不太好意思地问。

“推翻三座大山的翻，出版的版。干什么的，你到厂里就知道了。”

“就我自己去吗？”

“不，咱们队有俩，四队还有几位。”

我从队部出来，心象悬起来一样。什么是翻版组呢？“组”这个词，毫无疑问是指一个小单位，象教务组、贫雇农小组等等。既然叫组，可见这个部门人不会多。可“翻版”是什么呢？我问了好几个人，都说不知道。我只好等一个“电影通”了，他今天一早请假还没回来。他是个老长春，过去曾去过几次“满映”，所以比我们这些从来没进过电影厂门的，要高明得多。他曾多次和我们讲过，摄影棚什么样，录音室什么样，电影是怎么拍的等等。我只好求教于他了。他刚进屋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你可回来了！快给说说，翻版组是干什么的？”他刚进屋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什么翻版组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翻版组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把我分配到翻版组了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，谁也不知道。

只好请教你了。”

“翻一板，翻一板。”他沉吟了半晌，才果断地说：“知道了，这是拍武侠电影的机关翻板，土法子把人翻进去的。”

“不对吧？”我半信半疑地说，“现在咱们也不拍武侠电

影啊。再说，也不是木板的板，是出版的版。”

“出版的版，对！那是搞照像之类的工作，翻版嘛……就是底片翻版……就是这样。”

“噢，这么说，我将来的工作，就是洗像片了。”

初 战 披 靡

七月八日

到厂已经几天了，忙着安排住处：抬床、搬桌子、找草垫子。

今天，组的领导给我们开了第一个会。陈导演在会上说：“我们这个翻版组，和新闻片组、美术片组一样，都是生产单位。我们的具体任务，是把外国影片翻成说中国话的电影。”“可我们一点也不懂外国话呀。”爱说爱笑的小李说。

“那不要紧，有翻译。你们是演员——配音演员，只管录音，把你们的话录到影片上，代替原来的台词，将来影片在影院上映，就是你们的话了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，既不是“机关翻板”，也不是“翻印底片”，是给外国演员配音！我刚想到这儿，陈导演又继续说：“所以，我们从现在起，就要进行业务学习：练发声、纠正字音、学习表演、还要学习外语。这儿有个计划，每人一份，你们都看看吧！”

八月十七日

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每天早晨练发声，上午和下午念报纸、纠正发音，晚上学外语。我那本从吉林市带来的，光华书店发行的《演员自我修养》已经又读了一遍，今天读完最后一章。但正式工作还没有开始。

下午看了一遍已经翻译过来的《普通一兵》，是在第七放映室看的。这是个小放映室，只有二十几个座位。在这里看电影完全不像在电影院那样的人声嘈杂、秩序混乱，这里安静极了。

放映之前，那位天天领着我们学习的陈导演，让我们集中精力，仔仔细细地看，说看完之后还要讨论。每个人都得发言，谈影片翻版的优缺点。哪个人物配得好，好在哪儿，哪个人物配得不好，缺点又在哪儿？

看完电影刚走出放映室，眼睛还没有适应外面较强的光线，组里的领导就把我找去了，交给我一个新任务——为一部就要出厂的纪录片配解说。

纪录片，我过去很少看。记得在小学念书时看过那种说日本话的纪录片，什么《新加坡陷落》、《珍珠港陷落》等等。银幕上一面落炸弹，一面哇啦哇啦地说着日本话。光复后，也只看过一些《民主东北》。但是从来也没想到解说问题。更没想到过有一天要由自己来当解说员。解说应该怎样说，录音应该怎样录，我虽然已经进了电影厂，但还象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。

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去请教那位交给我解说词的编辑。他说：

“那好办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一看就明白。只要你先把词念熟点就没问题。大后天正式录，上午八点在第一录音室。”

不用说真录，就是听他这一说，我的心就开始剧烈地跳起来了，连自己都听见“扑咚”、“扑咚”的响声。

八月十九日

为了这个解说，已经有两个晚上睡不好觉了。词倒是念得很熟，几乎都能背下来，但一想到录音，心里就十分紧张——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但是但愿今晚能睡一宿好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起床了。洗漱完毕，穿上衣服，匆匆忙忙地赶到厂里。天刚蒙蒙亮，厂里的门还没开，我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阵一阵地跳。今天终于要进第一录音室了。

从早晨起来，心就像悬起来了似的，怎么也不舒服，饭也吃不下去了。这一天，我什么也没干，就在家胡思乱想。

我到厂虽已一个多月，还从来没有进过第一录音室。只是在外边听人家告诉我，这就是第一录音室。从门口看去，它和那几个摄影棚也没什么两样，门也开在摄影棚的大走廊里。

上班的时间到了，我先到办公室找了李编辑。他正在改那份就要录音的解说稿，看我去了忙说：

“正好你来了，这有几个地方还需要改正改。”

他把手里的稿子交给我，他用红笔改了几个地方，又还给我，说：“你照着改吧。”

我拿着稿子，心里一阵一阵地跳。我本来应该仔细地看看这里的一切，但今天我却什么心思也没有了。只见很多人出出进进的，有些人还提着小提琴、黑管等各种各样的乐器。我向编辑：

“他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和你一起录啊，影片上不是有音乐吗，他们演奏，你解说。”

“啊？和这么多人一起录？”我的心一下子飞到半天空去了。

“我要说错了怎么办？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错了不要紧，把底片翻过来，用另外的一面再录一次。”①

①当时是用光学声底录音，一面作废了，只能翻一面，再录一次。不像后来用的磁带可以多次使用。

“要是又错了呢？”我心里实在没底儿，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那就只好把这条胶片拿出来作废咯！”

说着，他把我领到一间小屋里，让我等着，他就走了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，这是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长条型的屋子，前边有个门，通到那个更大的象个大厅似的地方。乐队就在那里，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，他们按照乐器和声部排列着位置。我呆的这间屋子就在乐队的侧前方，乐队队员身后的墙上就是巨大的银幕。指挥是背对着我，面向乐队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银幕；而演奏员是只看指挥，不看银幕的。

我这间屋子和他们之间只相隔一道墙。墙的大半部分镶着两层大玻璃，我只能通过动作看出演奏员的活动，声音是一点也听不到的；这又使我觉得挺别扭。只在偶尔有人把那厚厚的两层门拉开时，才突然传来了乐队那杂乱的小提琴、小号以及其它乐器的定音与练习的声音。

我这个屋子，在离窗三米的位置上放着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桌子的上方吊着一个麦克风，这不用说，是给我准备的。

正当我不知道应该坐下，还是应该站着的时候，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对我说：

“来，你坐到椅子上，我看看麦克风的位置。”

我马上坐到椅子上，又把解说稿放到桌上。他看看麦克风，又动了动架子，还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方向，这才似乎满意了。我以为他会对我提出什么要求，可他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喂，同志，我什么时候开始说呀？”我赶忙问，生怕他走了。

“啊？嗯……”他沉吟了半天，也没回答上来。看样子，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“一会儿李编辑就告诉你了。”他好歹想出这么一句话。

说完就匆匆走了出去。又剩我一个人孤独地呆在这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的地方。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在森林中的情景。森林中的音响是丰富的，各种鸟叫、风声、昆虫的飞鸣……有时会偶尔出现短暂的寂静，就使人感到可怕、恐怖，似乎有什么厄运在等待着你。

我今天就有这种感觉。

我开始羡慕那些乐队队员了。人家再紧张，总还是大伙在一起，可以互相壮壮胆。可我……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这个“孤岛”上，只能看见人家活动，听不到一点声音，这可真难受。

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李编辑总算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吧？”

“好了。”其实我心里也闹不清什么叫“准备好了”，我只是顺应着回答。

“那好，我们开始正式练习两遍。行了就实录。”说完他要走，我赶忙问他：

“我什么时候开始说呀？”

“啊？对，你看这个红灯，”他用手指了一下大玻璃窗台上的那个黑呼呼的灯说，“红灯一亮，你就说，一段说完就停，看红灯再亮，就说下一段。好，咱们试一试。”他匆忙地走出去了。

怎么，每说一段都要看红灯？又看稿、又看灯、还要看银幕，那可怎么看得过来呢？万一跟不上怎么办？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。我开始注意前厅的动静，很怕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人家开始了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乐队员也和我一样，都一动不动地等在那儿，偶尔有一、两个乐队员还回头看看银幕，大约他们心里也不轻松。

这时，突然前厅的大灯关掉了，银幕上方的一个写有“开始”字样的灯亮了几下，还伴随着一个长声的电铃“咣……”。接着电影就放出来了，先是“预备”两字，然后是“一、二、

三”。放出的画面是一个城市“五一”节的庆祝活动。我一面注视画面，一面用眼睛的余光，斜视着那个至今我还看不出它是个红灯的灯。正在这时，那灯果然一下亮了，发出一种暗红色的光，它确实是一盏不折不扣的红灯。我开始念第一句解说词：“五一劳动节，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。在解放了的东北，劳动人民欢度自己的节日。”

“东北解放区的首府……”我念完第一段，我马上又把注意力从解说稿转移到红灯上去，等着念第二段。

念到第三段时，我出了个错误，把“劳动人民欢庆……”念成了“劳动人民欢‘竟’……”，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，偷眼看了一下外面的乐队员，他们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，照样拉琴吹号。“也许这是练习还不要紧”，我心里嘀咕着。但是词却接不下去了，中间停了两段没有念。到第三段时，红灯又亮了，我还没有念。紧接着红灯又闪了两下。虽然事先没有规定什么，但我明白，这是催我把下面的词念出来。我念完第二段，第三段试完了，李编辑急匆匆地走进了解说室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！”他大声地嚷着。但一看我那惶恐不安、深感歉意的样子，他好象把准备好了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反而以安慰的口气对我说：“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只是练习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出错是谁也难免的。还好，方才不是实录，没关系。不过你以后一定要注意！”他在注意两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，“再错了，一定不要再停，要接着念。不管是实录还是练习，念错一处千万不要停下来，要接着往下念！还有……”他沉吟片刻，似乎在斟酌玉面的话怎么说才好，“你要注意情感，方才念得太平了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沈阳解放后的第一个‘五一’劳动节，解说的调子应该是高兴的，有欢庆祝日的味道。不要象小孩背书似的‘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’……”李编辑一面前后摇晃着身体，一面平平淡淡地学着小孩背书的样子。接着又对我说：“要有情感，要有节日的愉快心情。你没

参加过庆祝“五一”的大会吗？”有个一脸门面的干部说：“参加过。整个城市都沸腾了，会场上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那你是高兴呢？还是愁眉不展，满脑门子官司？”李编辑说：“高兴。”

“对呀，一定要高高兴兴的，节日嘛。好，咱们再练一遍。注意情感！”说着，他走了出去。

注意情感，注意红灯，不要象背书……我脑子已经有点发木了。

“……练完这遍之后，李编辑气冲冲地走了进来。”

“你干嘛那样强调‘劳动人民’、‘欢庆’、‘群众大会’这几个字？太假了，都不象人说话了。还有，位置也全乱了。一开始，我一给灯，你就说晚了，后面也就都晚了半拍。我看你也不管红灯了，‘我给灯，你不说，我不给灯，你倒说了。’把司仪员的话说到政委画面上去，把工人的话，说到农民身上去了。这怎么行！还得注意红灯，注意解说词的画面位置。灯一亮马上就说，不要拖。好好练最后一次！”说完，他又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

我的绷得紧紧的神经，几乎要断裂了。

我镇静了一下，又全神贯注地盯着红灯。生怕再说得晚了，跟不上画面。

这次由于我心里只想着红灯，别的什么也管不了。结果，解说词的位置是对的，可情绪大概是更没有了。李编辑这次到我的屋里来，好半天也没说话。他只是这儿站站，那儿站站，不知道他的眼睛看着什么地方，更不知道他想些什么。他只是不断地轻轻摇着头，嘴里好象还在低声地嘀咕着什么。当他从我的左边走到右边，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时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录吧，别错过位置。”

上地翻腾起来了。以致这一遍从一开始我就处于一种糊涂状态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解说词怎么念的，念得好不好？哪些地方对，哪些地方不对？我干脆都不知道了。而且就连指示我开始、停止的红灯我也感觉麻木了，似乎看到了，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到。总之，所有这一切，在我的头脑里，都恍恍惚惚，似有似无地搅在一起了。我费了好大的劲控制自己，才没从椅子上跌下去。录音又重新开始。第二遍自己录音结束了很久，人家都收拾完东西了，我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。据李编辑告诉我，这遍又错了几个地方，说“东北人民政府”，我念了两个“政”字，不过他紧接着说等等，再听一下。“这没关系，抠掉一个‘政’字好了。”人做主了，我作为配音员说：“怎么抠掉，能抠掉吗？不好。”

“能，那很简单，让剪接同志把那个字的声波刮掉就行了。这是一种补救方法。我为什么说你说错了也不要停呢？就是因为错的不多，可以补救。”第二天下午，我坐在椅子上，脑子里已经很深了。我还在反复地想着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紧张，还是只有我自己这样？是身体的原因？精神的原因？还是性格问题？……我心里明白，我这配音演员生涯的第六步，算是失败了，彻底地失败了！

午夜十二点十分

第二天下午，我坐在椅子上，脑子里已经很深了。我还在反复地想着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紧张，还是只有我自己这样？是身体的原因？精神的原因？还是性格问题？……我心里明白，我这配音演员生涯的第六步，算是失败了，彻底地失败了！

《俄国问题》这部影片，已经开始工作将近一个星期了，看了四次全片。导演在今天的全组会上，报告了影片的主题思想，